



# 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波动如何影响了消费波动?

## ——基于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巩师恩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基于农民收入来源不同和消费类型差异,文章从结构视角研究了经营性收入波动、非经营性收入波动与食品消费波动、非食品消费波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具有稳定性质的经营性收入的波动是影响各类型消费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具有稳定性质的经营性收入波动对具有稳定性质的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远远高于对非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而具有非稳定性质的非经营性收入波动对具有非稳定性质的非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对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金融信贷等因素对农民食品消费波动具有明显的平抑作用,但对非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恒久性收入假说在收入和消费结构层面上的合理性。文章的政策涵义为:一方面要采取政策措施稳定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其是稳定消费的关键;另一方面要通过促进金融发展等政策措施提高农村居民平滑非食品消费波动的能力。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波动;消费波动;收入结构;消费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8;F0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4)06-0019-07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快速提高,然而也伴随产生了较高等度的收入和消费波动现象,<sup>[1]</sup>成为影响改革开放成果体现和人们效用水平提高的不利因素。

收入与消费存在着天然的内在关系。在有关消费行为的许多事实中,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在经济周期中收入和消费同时波动。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收入和消费同时下降,当经济繁荣时,收入和消费都迅速上升。<sup>[2]</sup>在国内外学者对于收入波动与消费波动关系的大量研究中,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还是弗里德曼和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恒久性收入假说(LC-PIH)等都认可上述事实的存在,不同理论假说分歧的关键在于对以

下两个问题及其原因的解答:第一,消费波动与收入波动的幅度是否一致?收入波动时的消费平抑机制是什么?第二,消费取决于何种类型的收入,是当期收入,还是恒久性收入,又或者是其他划分方式的收入类型?遗憾的是,相关理论假说存在一定的分歧,实证上的相应研究结论也莫衷一是。<sup>[3-7]</sup>

现有国内文献已经关注到中国收入波动和消费波动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是从收入和消费总量角度进行的研究:如马小勇、白永秀研究了农户收入波动情形下社会资本、金融发展对于消费波动的平抑;<sup>[8]</sup>李凌发现,不同收入等级消费群体的收入波动,随着收入等级递增,城镇居民消费波动先下降再上升,而农村居民消费波动递减。<sup>[9]</sup>也有不少文献从结构视角对农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主要关注收入和消费的静态水平和增长关系:如张秋惠、刘金星将农户家庭收入分为基本收

收稿日期:2014-09-1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SK20140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JL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JL01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JDB022)

**作者简介:**巩师恩,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人和非基本收入,发现非基本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胜于基本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sup>[10]</sup>基于恩格尔定律的影响,巩师恩将消费分为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发现农户不同来源收入对于食品消费、非食品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sup>[11]</sup>类似的研究者还有温涛等,发现农民收入结构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区域差距。<sup>[12]</sup>鲜有文献从结构视角探讨不同类型收入波动和消费波动的关系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户的收入可分为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四类。从农民身份特征而言,以农业经营性收入为主的经营性收入是农民的主业收入,具有和其他三类收入不同的特性。另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类型则可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化教育及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等八种类型,无疑其中食品消费是最具有必需品特征的消费,甚至于在很大程度上食品直接来自于农民的农业经营所得,同时食品消费也受到恩格尔定律的制约,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随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的特征。因此基于结构视角探讨收入和消费波动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本文余下部分的内容如下:第二部分探讨不同来源收入 and 不同类型消费的相关特征事实,以及不同类型收入波动情形下农民消费调整的结构性和

消费波动的平抑机理;第三和第四部分通过构建不同类型消费与不同来源收入关系的计量方程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文章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二、特征事实和理论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按照收入来源,中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分为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共四类;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分为食品消费、非食品消费。

既然收入波动与消费波动之间存在理论和事实上的关系,那么不同类型的收入 and 不同类型的消费之间存在何种相关关系呢?为了探讨这一研究主题,首先需要考察不同类型收入与纯收入的特征关系,不同类型消费与总消费的特征关系。本文使用 1993—2012 年间中国大陆地区 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因数据缺失太多,除外;重庆数据和四川合并计算)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根据农民的身份属性,将其收入分为农民主业的经营性收入和非主业的非经营性收入(包括工资性、财产性和转移性等三类收入),对于不同类型的收入进行统计上的特征分析,相关数据如表 1 中所示。

表 1 中国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描述性统计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纯收入	非经营收入
均值(元)	1205.71	1830.80	90.11	197.00	3323.59	1492.79
占纯收入比例	0.36	0.55	0.03	0.06	—	0.45
标准差	919.57	750.19	72.88	187.48	1920.24	1176.68
变异系数	0.76	0.41	0.81	0.95	0.58	0.79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约为 0.55,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非经营性收入占比约为 0.45,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约为 0.36,财产性收入占比约为 0.03,转移性收入占比约为 0.06。通过构建相关变量的变异系数考察不同来源收入的波动特征,并将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合并成非经营性收入进行计算,发现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的变异系数值远远小于其他不同类型来源收入的变异系数值,也即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波动程度远远小于其他不同类型来源收入。上述特征表明,经营性收入作为农民的主业收入,具有相对稳定性、保障性的特征,农业经营活动作为农村居民的主业活动,构成了其收入的稳定来源<sup>[13]</sup>,而其他非农业经营性活动,则构成了农村居

民收入的相对非稳定来源。

不同类型收入的不同波动程度影响了农户预期其恒久性收入的“理性”程度。根据恒久性收入假说,消费者面临收入的波动,并尽可能在不同时期之间平滑消费,在任何时刻,消费者根据现在对一生收入的预期选择消费水平。农户经营性收入和非经营性收入波动的程度存在不同,对于农业经营性收入,农民理应具备较强的预期能力,然而在非经营性收入的获取中,农民处于被动性的地位,其不能够决定转移性收入的水平,工资性收入又取决于主要是非农业经济的经营环境,农民对此的预期能力可能十分有限。因此不同类型收入所具有的不同波动性的特点,以及农民对不同类型收入的预期能力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其对于消费行为的决策,这为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收入与消费波动之

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与不同来源收入的特性分析相一致,本文继续考察不同类型消费支出所具有的数据特征,考虑到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性质上的差异,当受到收入波动影响时,家庭可能对于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具有不同的反应机制,食品消费无疑是最具有必需品特征的消费,是家庭首要考虑的消费种类,本文将消费分为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两类,相关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描述性统计

	食品消费	非食品消费	总消费
均值(元)	1248.45	1574.38	2822.83
占总消费支出比例	0.44	0.56	—
标准差	561.93	1074.82	1634.49
变异系数	0.45	0.68	0.58

表2中显示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两个特征:其一,从不同类型消费的数量来看,非食品消费量高于食品消费量,成为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消费类型;其二,从不同消费类型的稳定性特征来看,食品消费变异系数值为0.45,非食品消费变异系数值为0.68,表明食品消费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特征,收入波动可能导致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波动程度的差异。

表1和表2所显示的不同类型收入与不同类型消费之间的关系符合本文的研究设想,虽然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波动程度与总消费的波动程度一致,但在结构上不同类型收入波动与不同类型消费波动显示出明显的差异:食品消费的波动程度低于纯收入的波动程度,结构上则高于经营性收入的波动,低于非经营性收入的波动;非食品消费的波动程度高于纯收入的波动程度,结构上则远远高于经营性收入的波动,低于非经营性收入的波动。

另外,根据反映收入消费关系的生命周期-恒久性收入假说(LC-PIH),居民对于收入的预期能力,金融发展程度对于居民信贷行为的约束等都可能对于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预期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居民的消费是取决于当期收入还是恒久性收入,而对于恒久性收入预期的不稳定也会导致消费的波动;居民的收入如果进行跨期的配置,在期初收入高于消费的情形下,居民可以通过储蓄自然形成,然而如果是期初收入小于消费,则消费要受到金融发展程度的制约,从而可能导致消费波动。对于处在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农村而言,显然存在以下几个基本事实:一是我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所决定的人们认识水平的有限

性;二是我国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所导致的家庭信贷约束;三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sup>[14-16]</sup>上述理论和中国农村的基本事实可能对收入与消费波动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导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情况既存在省际区域间的差异,同时又存在随时间而变化的特征,所以本文建立以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的计量关系模型。考虑到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的不同特性以及家庭在收入波动情形下可能对消费进行的结构性调整,<sup>[12,14]</sup>本文分别以食品消费、非食品消费和总的生活消费的波动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囿于关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统计数据始于1993年,本文选择1993—2012年中国大陆地区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重庆数据和四川合并计算;西藏的数据缺失太多,剔除)。本文采用的基础模型如下所示:

$$cv_{it} = \alpha + \alpha_1 oyv_{it} + \alpha_2 noyv_{it} + \beta X_{it} + \mu_{it} + v_{it} \tag{1}$$

$$fcv_{it} = \alpha' + \alpha'_1 oyv_{it} + \alpha'_2 noyv_{it} + \beta' X_{it} + \mu'_{it} + v'_{it} \tag{2}$$

$$nfcv_{it} = \alpha'' + \alpha''_1 oyv_{it} + \alpha''_2 noyv_{it} + \beta'' X_{it} + \mu''_{it} + v''_{it} \tag{3}$$

模型(1)、(2)、(3)分别为总消费波动、食品消费波动和非食品消费波动的回归关系模型,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度,相关变量的说明如下:

*cv<sub>it</sub>*、*fcv<sub>it</sub>*、*nfcv<sub>it</sub>*分别代表总消费波动、食品消费波动和非食品消费波动水平,*oyv<sub>it</sub>*代表经营性收入波动水平,*noyv<sub>it</sub>*代表非经营性收入波动水平<sup>①</sup>。由于消费和收入等经济变量有随时间增长的长期趋势,所以对其波动程度的测算需要考虑其增长趋势,现有研究中对类似变量的测度大致上采用两种方案:一是使用变量增长率的变动程度表示其波动程度;<sup>[15]</sup>二是使用去除趋势的统计方法,如一阶差分法、时间趋势法、HP滤波法、BP滤波法等,通过去除长期增长趋势,并用得出的变量缺口值除以趋

①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波动的合并计算



势值表示波动幅度。<sup>[1,17]</sup> 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考虑到收入和消费增长的趋势性和变量的平稳性特征,首先对数值对数化,然后用 HP 滤波方法进行处理,从而进行波动程度的计算。

$\mu_{it}$  和  $v_{it}$  分别表示不可观察的逐个省份的个体差异与随机扰动。 $\alpha$  代表常数项, $\alpha_1$ 、 $\alpha_2$ 、 $\beta$  分别代表不同变量的系数值。另外本文选择能够平滑消费波动的金融因素、理性预期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等作为控制变量,相关变量选择的具体说明如下:

根据前文中的理论分析,当收入波动时,家庭将通过金融因素主动平滑其可能的消费波动,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家庭储蓄,二是家庭贷款。假设家庭的生存周期为两期,则当第一期家庭当期收入相对恒久性较高时,可以选择储蓄,以备付下一期的收入不足;当家庭第一期收入相对恒久性收入较低时,在金融发展程度满足的情形下,可以通过信贷进行消费,在第二期时家庭用超过消费的收入偿还信贷。《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提供了关于不同地区农户储蓄的相关数据,按照其对指标的相关解释,“农户储蓄”为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吸收的储蓄存款。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并没有提供农户贷款数据。通过检索,《中国金融年鉴》中提供了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分地区储蓄和贷款数据,考虑到农村信用社在农村贷款市场的份额较大的现实情况,在现有相关研究中,如张兵、刘丹(2013)直接使用各省份农村信用社的年末贷款总额来反映各省份的农村金融资产总量。<sup>[18]</sup> 与其研究不同,本文扩展了农村金融指标的内涵,假定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大致具有相同的存贷款比例,由此可测算出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所定义的“农户储蓄”对应的“农户贷款”数据。下文的实证部分将分别从农户储蓄和贷款两个方面进行计量分析,由于关于收入和消费的统计数据是以人均值作为统计单位,因此本文使用各地区金融变量除以农民常住人口数量,得到人均储蓄和人均贷款变量,在实际计算中使用其对数值。

需要说明的是,地区农村人口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在2005年以前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统计中使用的是户籍人口,2005年(含)之后的统计中使用的是常住人口。显然常住人口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另外,1990年、2000年与2010年进行了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公布了农村分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参照雷潇雨、龚六堂(2014)的方法,<sup>[19]</sup>

使用这三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对其他缺失常住人口年份的数据进行了推算,最终得到1993—2012年完整的分地区常住人口数量。

相对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恒久性收入理论的拓展的关键在于微观主体对于收入预期的“理性”及其程度。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尤为重要,中国的农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限制了农民的预期能力,从而使得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可能存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提供了关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分地区数据,按照文化程度的高低,将人口分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程度、初中程度、高中程度、中专程度、大专及大专以上等6个等级,依据常识和文献的通常做法,本文将上述6类文化程度进行了数量转化,将“不识字或识字很少”设定为受教育年限为零,“小学程度”设定为6年,“初中程度”设定为9年,“高中程度”和“中专程度”设定为12年,“大专及大专以上”设定为16年,再根据各类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可测算出地区年度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以此作为反映农民“理性预期”能力的代理变量,在实际计算中使用其对数值。

借助社会资本弥补收入波动是农户重要的行为方式,在相关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中,常常使用社会关系等(如是否党员、亲友数量、礼金数额等)作为变量,<sup>[20]</sup> 这与本文从宏观视角选择变量的基础不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提供了各地区农村社会救济费和自然灾害救济费的相关统计数据,农村社会救济费主要由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构成,这对于稳定和满足低收入农民的消费支出无疑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自然灾害救济费无疑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民因灾害导致的收入减少,有利于减少消费波动。在实际计算中使用人均社会救助费的对数值作为代理变量。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之前要确定截面之间的差异是固定差异还是随机差异,可以使用基于随机效应的 Hausman 检验来确定。另外,还需要消除残差存在的序列自相关等问题。综合考虑,本文在各个模型中分别取 AR(1) 以尽量消除所选择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存在的残差序列自相关,从结果中的 D.W 值来看,总消费方程、食品消费方程受

到序列相关的影响已经较小,非食品消费方程已经  
没有序列相关的影响。应用模型(1)、(2)、(3)、  
(4)估计总消费波动的影响因素,其结果如表 3 中  
所示;应用模型(5)、(6)、(7)、(8)估计食品消费

波动的影响因素,其结果如表 4 中所示;应用模型  
(9)、(10)、(11)、(12)估计非食品消费波动的影  
响因素,其结果如表 5 中所示。

表 3 总消费波动回归结果

模型	总消费波动			
	(1)	(2)	(3)	(4)
经营性收入波动	0.593 *** (0.023)	0.592 *** (0.024)	0.580 *** (0.093)	0.599 *** (0.094)
非经营性收入波动	0.235 *** (0.064)	0.233 *** (0.064)	0.229 *** (0.063)	0.240 *** (0.064)
储蓄	-0.006 ** (0.003)	—		
贷款		-0.007 ** (0.003)		
预期能力			-0.164 ** (0.072)	
社会救助				-0.002 (0.001)
AR(1)	0.316 *** (0.068)	0.317 *** (0.069)	0.318 *** (0.066)	0.312 *** (0.069)
R <sup>2</sup>	0.714	0.714	0.716	0.713
D. W	1.883	1.887	1.901	1.891
固定效应	Y	Y	Y	Y

注:1.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标准差;3. 各个回归模型中均包含常数项,模型系数协方差的估计方法为 White period。表 4、表 5 同。

表 4 食品消费回归结果

模型	食品消费波动			
	(5)	(6)	(7)	(8)
经营性收入波动	0.698 *** (0.087)	0.696 *** (0.088)	0.674 *** (0.088)	0.704 *** (0.087)
非经营性收入波动	0.173 *** (0.045)	0.172 *** (0.045)	0.166 *** (0.043)	0.177 *** (0.046)
储蓄	-0.009 ** (0.003)	—		
贷款		-0.009 ** (0.004)		
预期能力			-0.257 *** (0.098)	
社会救助				-0.004 ** (0.002)
AR(1)	0.387 *** (0.054)	0.389 *** (0.056)	0.395 *** (0.054)	0.385 *** (0.054)
R <sup>2</sup>	0.713	0.713	0.718	0.712
D. W	1.716	1.724	1.752	1.720
固定效应	Y	Y	Y	Y

表 5 非食品消费回归结果

模型	食品消费波动			
	(9)	(10)	(11)	(12)
经营性收入波动	0.497 *** (0.089)	0.496 *** (0.089)	0.493 *** (0.086)	0.499 *** (0.091)
非经营性收入波动	0.309 *** (0.083)	0.308 *** (0.083)	0.306 *** (0.084)	0.313 *** (0.081)
储蓄	-0.002 (0.004)			
贷款		-0.003 (0.004)		
预期能力			-0.065 (0.078)	
社会救助				0.0002 (0.002)
AR(1)	0.207 *** (0.058)	0.207 *** (0.056)	0.204 *** (0.057)	0.207 *** (0.059)
R <sup>2</sup>	0.643	0.643	0.643	0.642
D. W	2.009	2.008	2.005	2.014
固定效应	Y	Y	Y	Y

从所示的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模型均显示出较  
好的拟合特征,整体相关度也较高。综合上述模型  
中显示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1)从收入来源的类型区分来看,无论是作为  
农民主业的经营性收入波动,还是非主业的非经营  
性收入波动都是影响总消费波动、食品消费波动和  
非食品消费波动的显著性正相关因素,且在各组回

归方程中均显示出经营性收入波动对消费波动的  
影响程度相对非经营性收入对于消费波动的影响  
程度较高。由于经营性收入是农民的主业收入,具  
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在性质上具有类似于弗里德曼  
所说的恒久性收入的特征,经营性收入的波动可能  
反映了农民长期收入及其预期的不稳定性,是决定  
消费水平及波动的重要因素。

(2)从消费类型来看,经营性收入波动对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远远高于对非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而非经营性收入波动对非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对于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由于食品消费是最具有必需品特征的消费类型,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这也就说明具有稳定性特征的收入与具有稳定性特征的消费之间具有更强的影响关系,具有相对非稳定性特征的收入与相对非稳定性特征的消费之间具有更强的影响关系,大致符合恒久性收入假说的基本思想。

(3)另外,加入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后,经营性收入波动、非经营性收入波动与消费波动的影响关系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这在验证核心变量之间关系稳健的同时,也得出来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控制变量中储蓄、贷款、预期能力与总消费波动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仅有社会救助的显著性水平较低(其概率值约为18%),这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农民预期能力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消费波动。将总消费分为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后,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显示出与控制变量之间截然不同的相关关系,控制变量与食品消费波动之间均显示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控制变量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食品消费的波动,然而控制变量与非食品消费波动之间的关系均不显著,这反映出在我国农村的金融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农民知识水平不高以及社会救助水平较低的情形下,金融发展及预期等因素最终主要是用于平抑最具有必需品特征的食品的消费,虽然从贷款的直接用途而言,一些微观调查的研究发现贷款的目的主要是用于非食品消费或生产性支出等,但农民在食品消费和其他支出之间所进行的调整无疑是导致食品消费较为稳定的重要原因;<sup>[21-22]</sup>另外,由于我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是针对低收入以及受到灾害影响的困难人群,社会救助主要是满足最基本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社会救助降低了农民食品消费的波动性。

##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含义

中国农民的收入可以分为农民主业的经营性收入和非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稳定性程度高于非经营性收入;消费则可以分为最具必需品特征的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食品消费的稳定性高于非食品消费。在对其上述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通过计量经济方法,从结构视角检验了

农民不同类型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相关关系,有三点重要发现:一是具有稳定性质的经营性收入的波动是影响各类型消费波动的最主要原因;二是具有稳定性质的经营性收入波动对具有稳定性质的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远远高于对非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而具有非稳定性质的非经营性收入波动对具有非稳定性质的非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对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三是金融信贷等因素对农民食品消费波动具有明显的平抑作用,但对非食品消费波动的影响不显著。上述发现从结构上验证了恒久性收入假说在中国农村收入和消费关系中的合理性。当然,囿于数据所限,本文未能考察省份内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收入结构与消费波动之间的关系,期待在以后的研究中使用更为细致的微观调查等数据予以补足,以得出更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研究结论。

上述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以增长为主基调的发展后,当前正过渡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如何调整经济周期波动将成为社会各界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而消费的波动不仅受到经济波动所导致的收入波动的影响,其本身也是经济波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研究收入波动与消费波动的影响机理,从而探究稳定消费乃至经济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采取政策措施稳定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其是稳定消费的关键;第二,要采取促进金融发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加强农村教育投入等政策措施,提高农村居民平滑消费,特别是平滑非食品消费的能力。

## 参考文献:

- [1] 张耿,胡海鸥. 消费波动小于产出波动吗? [J]. 经济研究, 2006(11): 37-47.
- [2] Gregory Mankiw N. 宏观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3] Thomas Mayer. The Propensity to Consume Permanent Incom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6, 56(5): 1158-1177.
- [4] Zeldes S P. 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2): 305-346.
- [5] Carriker G L, etc. Propensity to Consume Farm Family Disposable Income from Separate Source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3, 75(3): 739-

- 744.
- [6] Chen, etc. Income Risk and Farm Consumption Behavior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9, 20(2): 173-183.
- [7] Kwon C W, Orazem P F, Otto D M. Off-farm Labor Supply Responses to 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Farm Income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9, 34(1): 59-67.
- [8] 马小勇. 中国农户的收入风险应对机制与消费波动?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 [9] 李凌. 消费波动、消费增长与中国经济波动 [D].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 2009.
- [10] 张秋惠, 刘金星.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 1997—2007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4): 48-54.
- [11] 巩师恩. 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与恩格尔定律: 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 [J]. *社会科学研究*, 2013(6): 27-31.
- [12] 温涛, 田纪华, 王小华. 农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的总体影响与区域差距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13(3): 42-52.
- [13] 周阳敏, 轩会永. 基于包容性的农民收入增长路径研究 [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1): 12-19.
- [14] 何兴强, 史卫. 健康风险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 [J]. *经济研究*, 2014(5): 34-48.
- [15] 巩师恩, 范从来. 收入不平等、信贷供给与消费波动 [J]. *经济研究*, 2012(S1): 4-14.
- [16] 沈悦. 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居民消费波动与政策选择 [J]. *经济学家*, 2001(2): 4-8.
- [17] 黄贻琳, 朱保华. 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事实的经验研究 [J]. *世界经济*, 2009(7): 27-40.
- [18] 张兵, 刘丹. 农村金融发展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3): 1-12.
- [19] 雷潇雨, 龚六堂. 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4(6): 44-57.
- [20] 梁爽, 张海洋, 平新乔, 等. 财富、社会资本与农户的融资能力 [J]. *金融研究*, 2014(4): 83-97.
- [21] 黄祖辉, 刘西川, 程恩江. 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 生产性抑或消费性——方法比较与实证分析 [J]. *管理世界*, 2007(3): 73-80.
- [22] 马晓青, 黄祖辉. 农户信贷需求与融资偏好差异化比较研究——基于江苏省 588 户农户调查问卷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10(1): 57-63.

(责任编辑: 宋雪飞)

## How Income Volatility of China Rural Residents Affects Consumption Volat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GONG Shie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ncome sources and consumption type,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perating income fluctuations, non-operating income fluctuations and food consumption fluctuations, and non-food consumption fluctuations from the structure perspective. Findings are stability operating income fluctuations mostly affect various types of consumption fluctuations; stability operating income fluctuations have effects on stability food consumption fluctuations far above on fluctuations of non-food consumption; non-stability non-operating income fluctuations have effects on the volatility of non-food consumption much higher than on the fluctuations of food consumption; financial credit to farmers has a significant stabilizing effect on fluctuations of food consumption, but has not significant effect on volatility of non-food consumption.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is reasonable in the structure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level.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polic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tabilize the operating incomes of rural residents, which is the key to stabilizing consumers; policies should be made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smooth non-food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 Income Volatility; Consumption Volatility; Income Structure; Consumption Structure